

（上接第一版）

古城的灵魂

  崞阳文庙,位于古城东门旁,因始建于元朝,是名副其实的州级文庙。

  可以说,文庙完善于明,繁盛于清。古时的文庙,气势恢宏,美轮美奂。在阔达两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百楹建筑星罗棋布,构造精巧;飞檐斗拱,灵动飘逸。凡开阔处名木参天,绿荫如盖。呈元宝形的泮池,蕴一池清水,映半方蓝天。文庙,因其鲜明而权威的尊孔崇教、修身布道功能,令莘莘学子万分景仰。而东庑配享的先贤40位、先儒33位和西庑配享的先儒35位、先贤39位,也是崞邑儒生的楷模和典范。

  古城的文庙同全国各州县的文庙建制大同小异,一条中轴线上从南往北建有礼门、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亦名大成门)、大成殿。围绕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分布着敬一亭、小石林亭、泮宫坊、金声玉振坊、德配天地坊、道冠古今坊、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尊经阁、文昌三代祠、魁星楼、忠义祠、明伦堂、节孝祠、教谕署、训导署、讲堂……

  崞阳文庙的大成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高达五丈开外,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绿蓝白四彩琉璃瓦,殿两端分置双飞矮檐,斗拱层密,气势轩昂。殿门为20扇镂花板壁门,各以四扇为一组,镂刻着梅花、艾叶、海棠、花灯等精美图案,工艺精巧,剔透玲珑。整个建筑可谓“承以崇台,盘以文石,虬柱云棂,华梁藻井”,十分华丽隆重。文庙的藏书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古崞邑,科举盛时,经过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进士的达50余名,考中举人的达450多名,其他科名的有500多名。

  崞邑一方水土,千百年来为民族融合为社会发展哺育了众多的杰出人物。正是他们不凡的理想抱负,以积聚久远的意志和诚恳,才使古城始终具有一种刚柔相济、兼容并蓄的气度,汲取着时代的精神与活力。

  崞县县衙旧址在今二中校园内,遗迹已经少之又少了,原先的规模亦不复存在。所幸清时有一位名叫郭汝霖的文人,手绘了一幅县署图,使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了解到明清时期县级衙署建筑的形式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筑上的体现,间接地感受明清时期封建王权与神权的结合,还可以从中欣赏明清古建筑的艺术,以及明清时期职官制度的变迁和发展。

  崞县县衙建筑规制受历代皇城帝府影响,强调正南直北中轴线对称,左文右武,前堂后寝,尊卑分明,上下有致,并结合在庭院布局之中。沿轴线从前到后六进六出,包括东西两侧共有30个院落,加上过厅游廊等总计房屋可达400余间。在县衙建筑群中,各单体建筑按功能和作用又分为行政管理、文化生活、神庙祭祀等三个系统。

  崞县衙门不仅坐北朝南,而且建筑在高台之上,面阔三楹,进深两间,左右里外对称,悬山式正脊顶,门两侧是传统的八字墙,门前两侧各蹲着一尊石狮,是皇权威严的象征,同时也是衙署的护门之兽。

  崞县衙署前建有照壁一座,东、西对称分列牌坊两座,东坊上书“代南首邑”,西坊上书“并北名区”。这种称谓并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发达的经济状况所形成的。

  进了衙门,即为仪门,是县衙中轴线上的第一进院落。仪门为三关六扇,东西两侧各有一座耳门。古人讲究东为上,所以东边的耳门叫“人门”或“喜门”,是供知县和署衙中工作人员平时出入



普济桥 王文君摄

千年瑰宝崞阳镇

的。西边的耳门叫“死门”或“鬼门”,只有提审犯人和押解死囚时才打开。

  仪门上走马板中上下三层共27格,中间三幅绘画的内容是福、禄、寿三星,其他是传统的二十四节孝图,正面悬挂楹联:“好学近智,力行近仁,知耻近勇;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

  更为重要的是,仪门上还高悬有“戒石铭”。昭示的是帝王对百官的警戒,是传统署衙中必须有的设置。

  左铭文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右铭文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戒石铭所在甬道两侧东西各有廊房九间,这就是县衙六房的所在。其中东三房是礼、户、刑,西三房是吏、兵、工。按东为上,文东武西排列。

  人仪门为正中甬道,建有牌坊一座,上悬雍正八年上谕恤刑一道。

  县署除了中轴线上的主建筑和其东西配房外,左右另外还建有多个院落,东边有东花厅、马号、三神祠、孚佑帝君庙等,西边有西花厅、书房、幕舍、大仙堂、狱神庙等。再往东即典史署,重修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进入典史署,要经过县署大门、仪门,由“光赞花封”牌坊入,这里分四进院落,内置督捕厅、大堂、内宅等建筑。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任过崞县知县的共有208人,其中进士24名,举人61名,其他科名123名,祀名宦祠的有24人。

  崞县衙署在岁月的长河中已经了无踪影,但那些具有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的官员们的名字,我们记下了。其不仅

名载青史,而且被一代一代地传诵着。

寻觅古城中的望族

  古城平和低调、不事张扬,两个家族几经发展,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出来,一个是亢家,另一个是贺家。

  亢氏一族和贺氏一族的发迹均始于明正统年间。这一时期,亢、贺两族都产生了一位岁贡生。亢家的名亢颜,后任县主簿;贺家的名贺思温,后任西和县训导。

  在明成化年间,亢家科名乏人,贺家却爆出冷门,贺瓚、贺璠兄弟二人同时考中丙午科举人。一时门庭若市、蓬荜生辉,阖族为之荣耀。

  嘉靖朝历45年,亢、贺两家的科名角逐出现了第二次。两家先是分别出了一名岁贡生,亢家的名庆鸿,后外任知县;贺家的名职,未见任职记载。不久,亢家的亢玘中戊午科举人。六年后,贺瓚曾孙、贺职孙贺愈也中了甲子科举人。

  就是这个名叫贺愈的举人,不甘于科名至乡荐而止,励志清苦,发奋勤学,七年后得中进士,列三甲55名。

  贺愈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贺氏子弟的进取心。紧接着在万历年,贺继冕、贺祥先后成为岁贡生,贺贡中丁酉科举人,而贺愈的曾孙贺海晏也被选为岁贡生。

  有明一朝,贺氏一族在科名上的成就高于亢氏一族,而望族的名声也比亢家大了许多。但是,满清定鼎中原后,亢氏一族压倒了风头正劲的贺氏。在清时的科名角逐中贺氏只出举人三名。

  无论亢、贺两族于明清两朝,在科举和仕途中孰强孰弱,他们的望族地位几乎同时形成,在整个崞阳古城内是显赫的,再没有哪一个家族可以与这两个家

族相抗衡。迄至今日,在古城的西关厢和临沱街上,仍然可以寻觅到亢家、贺家残存的旧居痕迹,以及于残墙断垣中渗透出的昔日荣耀。

岁月深处的普济桥

  普济桥,原为古城内四座石桥之一,也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唯一石桥。

  这座石砌拱桥,用行凿石和雕刻石砌成,主桥全长30米,宽8米,高7米。两端各有一引桥,桥身两边均置雕石实体栏杆,分别有望柱20根、栏板19块,方正的望柱顶部有仙桃、石榴、佛手等果品石雕,栏板系整石卷边镂花。石桥体由单孔长券和4个小券孔组成,券口边框和券楣均有造型精美、工艺考究的石刻浮雕。大券口除两边雕有汲水兽头像外,还雕有故事人物组画16幅;小券口边上雕有蛟龙出水及九针图案等。所有雕饰典雅精致,线条流畅,活灵活现,寓意深刻。桥面用石板铺筑,分三个行道,由两条与桥身走向一致的立石带分隔。

  普济桥的最早修葺时期是在明洪武六年(1373年),而且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道光十年(1830年)、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五年(1879年)相继修过四次。但不知何故,这座石桥竟能抗住1952年那次大地震,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就此,它成为了山西省最古老的石桥之一,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载入《中国古代桥梁史》,并被人们誉为“小赵州桥”。

  普济桥上,有着斑斑驳驳的苔痕。挂着一串串藤蔓的古朴桥身,连接着青砖黛瓦的寻常巷陌,不由让人细细端详慢慢品味。

  道光十年(1830年)六月十九日夜,高距水底三丈、宽容水道七丈六尺、桥面可容车乘六辙的普济桥,突然崩塌。崞县著名书画家范起用精炼的16个字记载了垮桥的惨状:“月钩全陷,霓脚半留,乱石攒泥,轮蹄惊避。”范起用文学的语言把桥拱比作明月和彩霓,可见其挚爱之情。

  普济桥的垮塌,南北交通瞬间阻断,“以驿递之孔道,又实偏乎守门,废置不可”。

  为了尽早修好石桥,乡首们开始登门逐户劝捐。仅仅数天时间,跑路不足百里,竟然捐得万余元。乡人们很受感动,不敢懈怠,“度工命匠,遵修坝旧规,各备资斧,轮流监造”。

  整个修桥过程,在范起的笔下场面壮观,动感十足:“斯时,截石移山,车运络绎,凿声盈耳,杂错纷腾。始而握底下扞飞铁楔者歌相和,继而寻根置石力木扛者肩相摩。负畚者、操筑者供奔走而备;使令者,日不下百余人。旧式纲样,易为斧式,匠氏挟绳尺以指挥,缝合甚密,盖不日而穹窿在望矣。”

  走上普济桥,就不敢把脚步放得太重,不然你就会踏醒一段历史。一座古石桥,就是历史的见证者。

（下转第四版）



栏杆上的浮雕



普济桥